

中国 佛教 文化

◎ 谢路军 潘 飞 / 著



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季羨林先生曾说：如果不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分析中国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更无法写什么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本书全面阐述了佛教在印度的兴起、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佛教主要派别、佛教与世俗社会、藏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佛教寺院、僧人、仪式，以及佛教与中国哲学、伦理、文学、音乐、美术等的作用和影响，力求用通俗的语言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脉络梳理清楚，并且将与佛教有关的文化知识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有思想有见解，深入浅出，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具。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佛教文化

谢路军 潘飞 /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文化/谢路军, 潘飞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445-1455-2

I. ①中... II. ①谢... ②潘...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中国
IV. ①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879 号

中国佛教文化

著 者: 谢路军 潘 飞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刘喜岩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917482

前言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也是之后所有佛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圈的“信源”。在印度产生的佛教文化，对东西方文化的结构和内容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介绍中国佛教之前，必然要先提到印度佛教。

距今4500多年前（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印度河两岸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类型——古印度文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发现表明，古印度文明的产生受到来自中东的早期文明的影响。在人类古文明诸类型中，古印度文明的出现不算最早，但它的分布范围却远远超过其他早期文明。^①更为重要的是，古印度文明孕育了第一个世界性宗教——佛教。当佛教与中华文明结缘之后，深刻地影响了后者的建构历程，并进而影响到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格局。

按照历史学的观点，古印度文明无疑同佛教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起码对后者起着哪怕是间接的影响。可是由于遭到来自欧洲雅利安人的入侵，以及自然灾害等不确定的原因，它消失得太彻底，没有留下任何

① 除古印度文明外，人类其他主要早期古文明及其出现时间如下：古巴比伦文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250年之间；古埃及文明：公元前3500年左右；古希腊文明：公元前3000~公元前1100年之间；古中国文明：若以商朝建立起算，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若以夏朝建立起算的话，则是公元前2070年左右；玛雅文明：公元前1600年左右；印加文明：公元前1000年中后期。

可供读解的文字记载。因此，在实际的文化研究之中，由雅利安人带入印度的婆罗门文化常常成为考察佛教起源的主体对象。

在以种姓制度为基本特征的婆罗门教文化中，有许多成为日后佛教思想的重要来源。可是，佛教却坚定地站到了种姓制度的反面，并最终成为唯一取代婆罗门教统治地位的文化模式。在接受中反对，在碰撞后重建，历史总是在破立的轮回之中前行。

佛教在印度的产生还取决于古印度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点。自然环境在人类文化，尤其是早期文化的形成、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人类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生产文化。因此，由生产文化发展而来的宗教、艺术、哲学等精神文化，就必然或多或少地带着自然环境的印记。那么，对于产生了佛教的古代印度文化而言，它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就全球地理的角度而言，印度地处欧亚大陆南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一直是世界真正的心脏地区，早期各主要人类文明大多发源于此。

印度东、西两面都是广袤无际的印度洋，南端与古锡兰岛（今斯里兰卡）隔海对望，东北部连接绵长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则与中亚大草原和伊朗高原相邻。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印度文明兼具大陆性文明和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既具有内敛性又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由于海上交往的范围与距离极其有限，因此印度文明在形成时具有的大陆性，也就是内敛性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情况在佛教产生之时依然持续。

这样的地理位置奠定了佛教不同于基督教等海洋性文明的文化品格，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佛教最初自印度向境外传播之时，主要选择向东北、西北的陆路传播，而向南的海路传播却仅跨越最宽处不过137公里的保克海峡到达锡兰岛而已。毕竟，对当时的古印度人而言，相对于无际的大海，山脉至少还可以下脚。

印度国内的地理特点也对它的文明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印度文明首先产生于印度河并迁徙到后来的恒河，而后来佛教恰恰产生于恒河下游地区。这再次印证了人类文化史的观点：伟大的文明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这些大河流域等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为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力和人力。

当然，地理环境不是全部。按照佛陀的看法，事物的形成是各种因缘聚合的结果，事物的毁灭则是各种因缘离散的结果。缘就是条件，那么除了地理之外，还有什么自然条件对古印度文明和佛教产生着影响呢？

那就是气候因素的影响。今天提起印度，可能很多人的最初反应就是那里的炎热。事实的确如此，几千年以来，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始终经受着高温的折磨。或许在远古的过去，这里曾是一个凉爽宜人的地方，或是在遥远的未来，这里将会变成那样，但在佛经记载里我们知道，至少从佛陀生活的时候起，这里就是一个“发着火”的国度，而且随着全球温室效应持续走高，

这个古老的热国也愈发变得炎热了。据说，2010年印度的高温天气，导致500多人热死。饱受高温折磨的人们自然渴求凉爽。因此，以善巧方便著称的佛教，针对印度的现实，将彼岸的美好描绘成了清凉、安宁的净土世界，而将恶道的痛苦以烈焰和干渴为喻，这无疑有助于当地人更加直观地理解佛法。如山西的五台山又名为“清凉山”。“佛”的本意也有“清凉”、“清醒”的意思。在被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里总是有清凉的风吹过，让人感到阵阵清凉。

清凉净土其他的殊圣景观在世间难得见到，但莲花是个例外。印度自古就有爱莲的风俗，盛夏的气候里，看见粉嫩绽放的莲花，尤其令人感觉清新惬意。因此佛法出现之后，契合民心，便常常以莲花作为譬喻，来形容佛法的稀有与智慧的美好。

印度现在有一项由政府设立的“莲花奖”，是对在科学、人文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人士的最高褒奖。印度政府曾于2008年将“莲花奖”授予我国著名印度文化学者季羨林先生，赞誉季老为“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以表达印度人民对这位毕生致力于推进中印两个伟大民族文化交流的世纪老人的崇高敬意。

作为佛教重要象征的莲花，它们之间的因缘首先出现在佛陀的诞生记录里。传说佛陀降生之时，出现了种种祥瑞，如百鸟群集，鸣声相合，四季花木一起盛开等，而其中一件奇妙的瑞相就是池塘里瞬间开满大如车轮的莲花，并且佛陀降生之时有七宝莲花盛开承接佛足。

当然，如果只是因为莲花增加了佛陀降生的传奇性，那么它成为佛教象征的理由显然太单薄了。本质上的原因，是莲花自身清灵、端庄、大方的外在仪态，同佛法圆融、清净、中道的内在思想天然相应；它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见宋代理学大儒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佛教顺应环境又不为所动、自我超越的独立品格。这和儒家士子喜欢兰花的道理是一样的。

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佛法并不执着，如果其他花草，比如玫瑰，能比莲花更好地表达佛法的内涵，佛教也会很愿意选择玫瑰作为佛法的象征的。

再深入一些，莲花的特质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佛教对此岸与彼岸的理解。佛教称我们所生活的此岸世界是“五浊恶世”^①，称彼岸世界为“庄严净土”。

^① 五浊恶世就是指目前我们生存的世界，五浊指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浊就是染污、不净、混乱的意思。据《佛说阿弥陀经》里的解释，劫就是时代，所以劫浊就是指时代混乱。见指众生的见解、价值观等，见浊就是指价值观混乱，没有正知正见。烦恼就是思想问题，所以烦恼浊就是指人们思想混乱，心理问题严重。众生在这里指众生的行为，众生浊的意思就是行为混乱，没有原则，导致自然、社会等生存环境恶化。命就是寿命，命浊指人们因为思想、心理混乱，引起疾病、灾祸丛生，致使寿命缩短，生命质量急剧下降。



因此，莲花所生长的环境（淤泥）代表了污秽的此岸，出淤泥而不染的花朵则代表了清净的彼岸，它生长开花的过程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修行。可以说，莲花象征着佛教修行的动因（离苦）、修行的过程（破迷）与修行的结果（开悟）。

莲花在佛教里随处可见，如《妙法莲华经》以莲花为题，佛陀传禅宗心法时安坐在“莲花台”上“拈花微笑”，以及藏传佛教的代表人物“莲花生大士”等。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对莲花品格给予同样高度的认同。莲花使佛法在传播中得到更好的理解，以致到后来几乎可以互为表喻。东晋高僧慧远大师在庐山结社念佛，起名号即为“莲社”。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得到了许多仁人志士的推崇。孙中山先生就说：“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学习佛学可补科学之偏”。梁启超先生更是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曾撰写《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国当代著名的佛教学者方立天先生将佛学的思想概括为六大精神，即缘起、因果、中道、平等、慈悲和解脱。这一概括是非常精准的，说明了佛学有着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堪称是最富有思辨性的宗教。

佛学的思辨性的智慧散发出无穷的精神魅力。在日本企业界，有一个“经营四圣”的说法，即日本战后经济崛起中最卓越的四位企业家。他们分别是松下公司的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本田公司的本田宗一郎和日本京瓷集团的稻盛和夫。稻盛和夫是四位中目前唯一健在的，被誉为“当代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将企业经营上的成就归功于佛教中所倡导的“利他主义”的理念。1997年，65岁的稻盛和夫身患胃癌，手术后宣布退居二线，只担任名誉会长，并正式皈依佛门，他在京都圆福寺剃度出家，专心修禅。其余大部分时间用于慈善事业和到世界各地演讲。稻盛和夫在回答记者所问出家的原因时解释说：“我在企业经营当中也经常要求员工帮助他人。日本有句话叫做‘人情并不是为别人’，意思是说善待别人就肯定有回报。中国也有类似的话‘积善人家有余庆’，做善事的人家子子孙孙都会得到幸福。就这点来说，我认为说佛教不适应资本主义、不适应企业经营盈利的说法是错误的，以佛教思想为基础从事企业经营远远比一般的企业经营高尚得多。”（湖南省怀化市佛教协会主办的《佛在人间》2010年3月第十一期，第2页）事实也的确如此，京瓷集团自创立47年来从没有出现过亏损，堪称日本企业界的奇迹。稻盛和夫为了践行菩萨道，还亲自体验托钵化缘的感受。刚好有个大婶在公园旁边做清扫工作，看上去非常贫穷，却一语不发地给了稻盛和夫一百日元，并说：“师父您一定很累了吧，回去的路上买个面包吃吧。”禅宗的寺院吃得很简单，一般是早中晚各一碗粥，菜只不过是两三根腌菜，那位大婶肯定知道这个情况才给他一百日元的。稻盛和夫描述当时的感受说：“当时我

拿着这枚硬币全身像被电击了一样感到无上的幸福，眼泪难以自禁，全身被幸福的感觉包围着，公园的所有景物也好像变得光辉起来。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原来这就是那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这位大婶给我的一百日元所蕴含的伟大的爱把我整个包围住，把我带到幸福的顶峰。”（湖南省怀化市佛教协会主办的《佛在人间》2010年3月第十一期，第2页）弘一大师曾将人的境界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第二个层次是精神的，第三个层次是宗教的。由此观之，稻盛和夫乃站在了人生的最高一个层次上了。

在中国的企业界也出现了一批以“佛商”而著称的企业家。如现有中国企业家中辈分最高的双星总裁汪海也信仰佛，并且把这种信仰移植到了企业管理中。在双星总部，矗立着一尊大弥勒佛像，佛像两边写着一段话：“自己拿自己当骨干，自我感觉良好”。在企业内部，汪海力图从责任的角度将自己塑造成企业和员工的“佛”。在双星集团，上班时间看佛教书籍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被鼓励的，成为中国企业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国还有一个因信教而出名的企业家叫薛永新，恩威集团的老板，形容薛永新的称谓有很多：白手起家的商人、20年不倒的企业家、中国第一慈善家、中国四大药王之一、极度虔诚的宗教弟子。很多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觉得他是半人半神的人物，每说一句话，都跟佛书相关。他还出资盖了一座庙，又捐资3500万元在四川大邑县修建佛教文化旅游城。相对年轻的“佛商”——凤凰卫视刘长乐是中国最著名的佛商。刘长乐与佛有缘，早在1991年已经开始：当时创立的“乐天公司”，是“凤凰”前身。命名“乐天”，有乐观、达观、豁达、远离政治、超凡脱俗的意思。创立初期，即与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合作，创办中国佛教文化数据库，善用现代电子数码技术，储存佛教资料，现在这些资料全部转入凤凰网页。港台媒体称刘长乐为“神秘的大佛”。其本人的长相还酷似弥勒佛，其“职业事业化”的管理理念也颇得佛家要领。2003年，刘长乐更巧妙地将企业管理和佛教的普度众生的理念结合起来，贯彻自己的“电视新法”。（以上参阅《亚太经济时报》之《禅文化周刊》2010年第03期，第21页）

佛教在企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是可以波及到人文社会的一切领域，服务于当今社会。

当今社会的竞争愈来愈激烈，由此造成的人的心理压力在不断增加。每天报纸上出现的各种刑事犯罪可谓层出不穷。北京大兴的同一个小区，名“清澄园”，在一个月出现了两期“灭门案”；还有连续出现的五起绑架杀害幼童案等，说明了当代人们的承受挫折和矛盾的心理在日益脆弱，人们的精神世界缺少善的理念的支撑。据相关卫生部门统计：目前，全国的精神病患

者高达一亿多人；自杀者每年高达 25 万人，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是两个骇人听闻的数据！在日本，这种情况则更为严重，几乎所有的高层楼房宾馆的窗户都是不允许打开的，其原因是跳楼自杀的人太多了，宾馆不愿承担责任；日本的高速地铁卧轨自杀的现象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如何来对治这种社会现象？我认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尤其是佛教中的“利他”精神更是可以帮助这个社会渡过难关的一剂良药。

因此，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服务于和谐社会，我和潘飞两人合著了这本《中国佛教文化》。这本书的特点是力求用通俗的语言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脉络梳理清楚，并且将与佛教有关的文化知识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我们衷心期盼读者能从这本书中更好地认识佛教，从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佛教在印度的兴起	1
第一节 佛教产生时的古印度文化	1
第二节 佛陀的传说	8
第三节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	14
第四节 佛陀的面貌	20
第五节 菩提树下证悟的“四法印与 四谛”说	22
第六节 临终四大遗嘱	28
第七节 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	30
第八节 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	32
第九节 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	34
第十节 印度佛教的对外传播	38
第二章 佛教传入中国	40
第一节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空因缘	41
第二节 “汉明帝梦佛”与佛教的初传	43
第三节 佛典传译	46
第四节 西行求法	52
第三章 中国佛教主要宗派	66
第一节 宗派佛教	66
第二节 一叶五花话禅宗	86
第三节 户户弥陀讲净土	124
第四节 禅净合一与居士佛教	142
第四章 佛教与世俗社会	157
第一节 三武一宗灭佛	157



第二节	佛教尘缘	165
第三节	人间佛教	183
第五章	藏传佛教与南传佛教	194
第一节	藏传佛教	194
第二节	南传佛教	208
第六章	佛教寺院	217
第一节	寺院名称的由来	217
第二节	佛像与佛塔	218
第三节	山门与天王殿	222
第四节	大雄宝殿	227
第五节	藏经与藏经阁	230
第六节	寺院管理制度	232
第七节	汉化寺院的特点	236
第七章	佛教僧人	238
第一节	僧人的出家	238
第二节	僧人的受戒	239
第三节	僧人的三衣	241
第四节	僧人的过午不食	242
第五节	僧人的安居	243
第六节	僧人的和睦相处	244
第七节	僧人的素食制度	247
第八章	佛教仪式	252
第一节	忏法	252
第二节	水陆法会	255
第三节	盂兰盆会	257
第四节	焰口	258
第五节	佛教节日	260
第九章	佛教与中国文化	263
第一节	佛教与中国哲学	263
第二节	佛教与中国伦理	268
第三节	佛教与中国文学	274
第四节	佛教与中国音乐	278
第五节	佛教与中国美术	281
第六节	佛教与中国舞蹈	283
第七节	佛教与中国民俗	287
	主要参考书目	292

第一章

佛教在印度的兴起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是产生最早的世界宗教。它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迄今已有2500余年的悠久历史。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传入中国，逐渐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融合，演变发展成中国化的佛教，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节 佛教产生时的古印度文化

入侵者雅利安人是古印度文化的重要创立者。这是一个神秘的游牧部落，起源已无法精确考证，比较确定的是他们属于白色人种，高身材、蓝眼睛等特点近似于现在的欧罗巴人。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他们中的一支向东侵入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并将自己的婆罗门教文化移植到当地，展开了有效的统治，印度也从此进入婆罗门教时代，直到佛教诞生。

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化都产生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内，佛教也不例外。那么，在公元前6世纪佛教产生的前后，印度社会文化的特征到底如何呢？

一、种姓制度

划分种姓并非印度的独创，柏拉图在其《理想国》



中就曾按职业高低贵贱的不同将人分为金、银、铜、铁四等。不过，将种姓如此严格地制度化，形成严丝合缝的社会等级结构，并以神的旨意为依据，提出一整套复杂的神学理论，建构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而且一直深刻影响到今天人们的社会生活，恐怕就非印度莫属了。

公元前 500 年左右，种姓等级制度正式登上印度政治舞台。关于它的起源，现在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那就是肤色是基本因素之一。事实上，种姓的梵文称谓“瓦尔纳”，正是肤色的意思。

依今天的审美眼光，当来自欧罗巴、肤色白皙、金发碧眼、有着大卫般身材的雅利安征服者们看到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当地土著时，人种上的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征服则使这种优越感得到了更加的强化。当然，肤色的胜利从根本上而言取决于权力。假设是土著们征服了雅利安人，那么黑色皮肤或许就是高贵的象征，除非土著们并不喜欢自己的肤色。

在统治者不遗余力的强化下，“瓦尔纳”逐渐成为一套复杂严密的、渗透到印度所有人种之中的公共权力与社会财富划分系统，并在世俗法律和宗教教令的共同保护下，最终形成了印度延续至今的阶级结构——“瓦尔纳”社会。职业特征、世袭性、表示种姓纯洁的复杂礼仪以及适合不同种姓的严格道德准则是“瓦尔纳”制度的四大特征。

权力与财富在世俗社会有一个最直接的体现渠道——职业，因此从职业里可以看出划分种姓的大致线索。“瓦尔纳”对种姓的划分基本上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最高级的种姓属于祭司阶层，被称为婆罗门；第二层次是国王和武士贵族种姓刹帝利；第三层次叫做吠舍，主要人群包括商人和部分地主；第四个层次被称为首陀罗，包括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最下层的阶级，他们卑微到甚至被认为不配参与种姓的划分，那就是“旃陀罗”，又称“贱民”，也被称为“不可接触的人”。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一样，人数众多的阶级往往处于社会的底层，直到今天，贱民的数量仍高达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强。高贵的种姓们在贱民身上慷慨地倾销了他们所有可能的负面情感：鄙视、害怕、厌恶等等。为此，他们利用手中世俗和宗教的权力对贱民进行了所有可能的限制、隔离和监视。

贱民们被要求聚居在远离四大种姓的偏远地方，从事屠宰、清道、掘墓等一切世俗观念中最低下的活计。他们绝对不能与四大种姓的人发生任何肉体的接触，包括在同一口井里取水。甚至当他们走出自己的聚居地的时候，也必须不断敲打手中的木板作为警告，以免自己不洁的声音和相貌落在那些“纯洁”的种姓们的耳朵和眼睛里。可以想象，如果技术上可能，他们呼吸过的空气也需要被过滤后才能继续流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真实的事件，一个

婆罗门妇女无意中看了贱民一眼，回家后立即自杀了，理由是被贱民的眼神玷污，只能用死来换回清白。

《观无量寿经》一开始就讲一个故事：摩揭陀国国王频婆娑罗王有一个太子，名叫阿阇世王，他听从佛教叛逆提婆达多的教唆，幽禁了自己的父亲，想饿死他，篡夺王位。阿阇世王的母亲韦提希夫人，为了营救自己的丈夫，沐浴清净后，用酥、蜜调和面粉，抹在身上，借探视之机，偷偷送给频婆娑罗王吃。过了些日子，阿阇世王见父亲还没有饿死，很奇怪。才知道是母亲每天偷偷送食物给父亲吃。阿阇世王大怒要执剑杀死母亲，这时候有两位大臣，一位叫月光^①，另一位叫耆婆^②，上前进言：“大王！臣闻《毗陀论经》^③说，劫初以来，有诸恶王，贪国位故，杀害其父，一万八千，未曾闻有无道害母。王今为此杀逆之事，污刹利种，臣不忍闻。是旃陀罗，我等不宜复住于此。”这里的“旃陀罗”应当就是印度婆罗门教所称的最下等人。可见，古印度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二、婆罗门教

作为一种独特的阶级社会体制，“瓦尔纳”的形成有着强大宗教支撑，那就是婆罗门教及其教义。在婆罗门神话里，四大种姓是从宇宙的最高神“梵天”的身体里生出来的，《梵书》中这样唱颂道：“梵天”的口里生出婆罗门，肩上生出刹帝利，脐处生出吠舍，脚下生出首陀罗，贱民甚至下贱到不配由梵天生出。人创造了神，反过来又匍匐在神的膝下，由神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和尊严。

婆罗门教最主要的教义体现为三大纲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其中贯穿了婆罗门教的三大基本原则，即法、因果报应和来世重生。

吠陀天启：梵天是创世主，宇宙和人间的一切“法”（即秩序），包括贫穷富裕、种姓贵贱，都是梵天的意旨，不可违反。

祭祀万能：贫贱是梵天对前世造下罪业的那些人在今生的惩罚，这就是因果报应。造罪之人必须受报，当然也可以通过献祭来尽快消业，以获得来世的新生。在种种献祭的供品之中，土地最被青睐，得到的评价最高，据说它可以消除献祭者的一切罪孽。

① 月光：Candraprabha（战达罗钵刺婆）之译，没有传记。

② 耆婆：Jivaka，译为活命、能活。系频婆娑罗王之弟。释迦牟尼时代的名医，为释迦牟尼和频婆娑罗王治过病，深信佛教。阿阇世王后悔时，劝其归信佛教的，就是此人。

③ 《毗陀论经》：毗陀系梵音 Veda，亦写成吠陀，系印度最古老的经典，为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有《犁俱吠陀》、《夜柔吠陀》、《阿达婆吠陀》和《沙摩吠陀》等四种。

婆罗门至上：婆罗门是至上神“梵天”在人间的永恒代言人，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其他种姓永远不可能成为婆罗门。

神授的教义成为控制人们心灵最有效的手段，三大纲领及其原则成为种姓制度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基础。而梵天永恒代言人的身份则使得婆罗门由此垄断了祭司阶级，永远成为世俗阶级的最高种姓，其高贵甚至超越国王种姓刹帝利。婆罗门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并借刹帝利等其他种姓之手实现。

在神意外衣的庇佑下，婆罗门祭司们充分利用了各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等世俗手段来集中权力、聚集财富、扩大收益。他们使用《梵书》等教义宣传手册来统一思想，表达诉求；通过大量的祭祀活动来统一行动；通过刹帝利制定法律“达摩”来制裁异端。在这里，婆罗门祭司们的社会角色千变万化，他们时而是巫师，时而是社会活动家，时而是善于垄断的商人，时而又成为精明强干的政客。但无论是哪种角色，婆罗门都已经提前站在天平的胜端，因为他们掌控了成功的杠杆，那就是人的心灵。一旦人们绝对相信自己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忠实地履行神意，就会老老实实地交出对于今生决断的权利，那么婆罗门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必须承认，婆罗门运用他们的学识和谋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不幸或幸运的是，神的教义未能说服所有人。一些愿意主动思索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人和他们的信仰逐渐成为了婆罗门的麻烦，佛陀和他的佛教便是其中的代表。实际上，在东方文化的基因中，从来对信仰外在的神及其绝对权威都没有太多兴趣，他们真正信仰的是自己，幸福绝非拜神所赐，命运完全取决于自己。

不仅如此，法、因果和重生等婆罗门教义经过改造，同样成为了佛教的核心思想，变成反对婆罗门教义最有力的武器。有盛必有衰，盛衰的因果律在婆罗门自己身上也毫无例外地得到了应验。

此外，虽然婆罗门教及其种姓制度为祭祀阶层暂时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但这也使得他们站在了所有其他种姓的对立面。一方面，刹帝利和吠舍们通过战争和商业经营，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人口与财富，但他们所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反而处处遭到婆罗门神权的掣肘和蔑视。另一方面，首陀罗和贱民们的队伍则由于战争俘虏和破产者的增加而迅速庞大，在祭司们无休止的压榨和摧残下，他们的生活濒临绝境，对来世重生彻底绝望，愤怒已经被压抑到了极点。

表面的平静之下涌动着暗流。这样，当各种身份角色和生活处境迥然不同的反对者们却对种姓制度表现出高度一致的愤怒和反对时，就最终引发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印度宗教改革。



三、经济的发展

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里，经济所起的作用都是带有决定性的，而一个比较公认的事实是，这一时期的印度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雅利安人自占领印度河流域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加上坚固、耐用、廉价的铁器的大量投入使用，迅速向东部的恒河流域扩展土地。这导致拓荒者们的生产形态发生重大转变，原来具有鲜明游牧民族特点的畜牧业开始转向农业。

相对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的意义之一在于促进了定居村庄和商业的产生及发展，而这正是城市形成的两个必要前提。在良好的定居条件下，农业产量的增加和村庄及人口的增长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为城市的形成作了充分的物质和人口准备，这一点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当时印度的强大王国和繁荣城市多数都出现在恒河流域。

伴随贸易的发展，更加便于流通的货币——铸币的出现是众望所归的，这尤其促进了大宗贸易的发展。不用说，比起早期大宗交易时所使用的价值单位——母牛来说，用金、银、铜制造的铸币显然轻便得多了。

丰富的商品、功能齐全的村庄、四通八达的贸易中心、频繁往来的商人、轻便耐用的铸币……当这些零散的部分组合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活形态和强大王国的基础——城市。在佛陀的时代，据说著名的大城市有八座，包括吠舍厘、舍卫国等，其中不少都曾是日后佛陀游方弘法所经过之处。

四、政治的变革

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政治的合并。随着城市的出现，从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到喜马拉雅山麓，再到恒河平原，原来相互独立或分隔开来的村庄和部落让位于以城市为中心的世袭王国及少数贵族共和国，佛陀的故国迦毗罗卫也是如此。

国家以有围墙的城市为中心进行统治，同时控制城市周围的部落、村庄等广大农牧业地区。王权由此而日益巩固和扩大，国王权势日增，地位空前提高。随着政治生态朝有利于国王统治的方向发展，社会的价值导向也随之发生改变。刹帝利国王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开始超越婆罗门，被认为是“人中最上者”，有许多人人为之倾倒，鼓吹“智者下劣，有权者优越”。

除去给国王阶层带来巨大受益之外，城市还直接促进了另一大种姓——



吠舍阶层财富的迅速膨胀、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全面攀升。作为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最为活跃的力量，巨商大贾成为社会新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商品的生产和经营，牢牢控制住城市的经济命脉。

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更高的政治诉求，吠舍们开始通过组建各种行会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要求，佛经中就有 18 种行会的记载。行会的首领被称为“长者”，拥有巨大财富，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上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其中势力特别强大者甚至可以直接同王权对话或谈判，干预其决策，佛经里关于祇树给孤独园的来历即含蓄地说明了这点。

祇树给孤独园是佛陀修行、传法时的一座著名精舍，位于当时的舍卫国境内，也叫祇园精舍。相传当时国内的给孤独长者发心为佛陀修建一座精舍，选址时看中了祇多太子的园林，于是想出钱买下供养佛陀。太子不愿出让，又不好直接拒绝，于是便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若要他让出园子，长者必须将园内地面都用金砖铺满，所谓“金砖为地”，否则免谈。太子满以为可以就此将长者吓退，孰料长者满口答应，随即从家中宝库调出大批金砖，连夜将园内地面铺满。太子一早入园看到这番景象，顿时目瞪口呆，只得答应出让，并将园中的奇花异树随喜布施给佛陀，祇树给孤独园的名称也由此流传下来。

总体而言，作为佛教的缘起之处，在当时的恒河中下游，国王与上层工商业者，即刹帝利和吠舍种姓，是社会最活跃的等级，占有统治地位。佛经里有许多关于佛陀度化国王和长者，促进弘法的记载。

社会财富的不平衡增长与王权的上升和新兴王国的涌现，使原有地区间国家关系的均势被打破，国内阶级矛盾增加。这样，国内、国外各种因素共同引发了此起彼伏的争霸战争。佛教诞生时，恒河流域分布了摩揭陀、拘萨罗、跋耆、犍陀罗等 16 个国家，史称“十六国”，而它们都是日后佛教重要的传播地。有意思的是，当佛教出现的时候，中国正值春秋时期，也在进行激烈的列国争雄；近 1000 年以后，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则更加巧合地出现了十六国逐鹿中原的场面，而那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

佛陀开始活动的年代，正值十六国逐鹿炽盛之时。长期的兼并战争，使刹帝利王权进一步加强，但付出的代价是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普通人民的巨大痛苦。在武力至上的观念下，许多获得集权的国王欲壑难填，野心膨胀，对本国人民和被征服者残暴无道，为所欲为，早期佛教经典中甚至把“国王之难”与“盗贼之难”相提并论。不少人为躲避战乱和残暴统治而逃亡到深山边地遁世隐居。